

回忆仪陇县的土地改革运动

县志办公室 罗定直

1951年，抗美援朝、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，仪陇县45万人民也积极投入了三大运动。是年夏天，我随仪陇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郭宪书到新寺区（今永乐区、含今大寅区）参加土地改革（以下简称土改）。郭任该区土改工作团团长，我在区团部办公室工作，至今38年了，土改中的许多人和事，仍象放映电影一样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。为了存史和教育后人，现据回忆并查阅有关资料，略记如下片断，如有失误，希知情人指正。

一、土改队伍。仪陇县土改工作团的队伍是由三部份人员组成的。一是刚参加过第一期南部县土改的工作人员，是领导骨干力量，占多数；二是仪陇土改训练班刚短期培训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，人数也较多；三是从仪陇县机关、团体、学校抽调出来的人员，人数较少。全县土改工作队伍总计一千多人，分布在七个区四十六个乡三百九十四个村。平均每村有三至四人，每乡有二至三人。村设小组，乡设大组。城关、土门、观紫、马鞍山、新寺、悦来、立山七个区都设有区团部（县委书记周慎任马鞍山区团长），团部有委员二至三人，由区委书记和大组长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担任，团部办公室四至五人，负责联系、检查、总结等具体事务工作。仪陇县土改工作团统一领导全县土改工作，团长是川北行署副主任秦仲方，县团部办公室有五至七人。

二、干部作风。土改干部工作和生活作风确是艰苦朴素，真正继承和发扬了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。比如：男女同志都是穿的灰色或兰色棉布衣服，统一带的“仪陇县土改工作团”布制胸章，脚穿草鞋或布鞋。食、住均在雇贫农家里，当时吃一次大米、白面很不容易，大都是吃米、面和小菜混合饭，不少户吃粗箩筛面或连麸面，煮成稀粥或搅团。记得我到芭蕉乡检查工作，还在一个村主席家里吃了一顿大麦面和南瓜花搅团，当时确难咽下去，但在该村常驻的土改工作同志和村主席家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更不用说吃肉了，十天半月都难吃上一次。土改干部开始住的茅草房，没收地主大瓦房作村办公处后，才住上瓦房。晚上照明有用桐油灯的，也有用桐子和桐节油的。干部到乡、区、县开会都是步行，芭蕉乡到新寺区团部开会来回120多里，立山区到县城开会来回280多里，从没有人缺席或迟到。当时的工资待遇都是低标准供给制，每月只发几万元（旧法币，相当于人民币几元，下同。）零花钱。洗衣被、补钉都是自己动手做。在那样艰苦的生活环境里，又是暑热的夏天，同志们都能吃苦耐劳克服困难，而且朝

气蓬勃干劲十足，三个月来起早摸黑，日以继夜地工作，根本没有节假日、星期天，更没有看电影、戏剧及其他文娱活动。绝大多数同志和群众打成一片，关系很融洽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土改结束时，农民弟兄姐妹热烈欢送工作同志，他们拉着工作同志的手，送了一程又一程，硬是难舍难分，不少工作同志和农民兄弟姐妹都激动得掉下了热泪。

三、步骤作法。我县土改，从六月初旬开始，到八月底基本结束，大致分五步走：一是了解情况，宣传政策。土改干部新到一地，人地生疏，情况不熟。首先必须了解情况，才能心中有数。比如，乡村干部思想、工作、组织情况，农民和地主的情况，各阶层人士对土改的态度等都要全面深入调查了解。宣传政策，主要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、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》、《惩治不法地主条例》等。通过各种会议（乡村干部会、村组群众会、雇贫农会、青年会、妇女会、对地主训话会等）运用各种形式（大会报告、小组讨论、个别谈心、黑板报、山顶广播、午校、夜校等），大张旗鼓地宣传土改的政策，做到家喻户晓、老少皆知。二是发动群众，划分成份。遵照《中央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》，对农村各户谁是雇贫农、中农，谁是地主、富农，谁是佃中农、佃富农、小土地出租等，都要准确地划得一清二楚，尤其对地主、富农不能错划、漏划。严格分清敌我友，才能认真贯彻依靠雇贫农、团结中农、中立富农、消灭地主阶级的路线。划分成份的方法是，自报公议，民主评定，乡农协会和工作组领导批准。因此，必须充分发动群众，让群众自己作主，在学好文件的基础上，认真进行评议。三是开展斗争，没收征收。主要是反违法斗争，这一阶段时间最长，任务最艰巨，工作最棘手。不仅从政治上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威风，把他们斗倒斗臭，而且要从经济上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，没收地主的五大财产（土地、耕畜、农具、多余的粮食、多余的房屋），追缴赔罚款。据统计，全县乡以上的联合斗争大会共开了一百一十四次，每次参加人数由二千至一万以上不等。参加控诉的有346483人，占全县41万群众（地主等除外）的84.5%。4094名地主中，被斗争的1310人，占32%，公审的164人，占4%；教育解决的1597人，占39%；守法没问罪者1023人，占25%，他们中有的只缴了很少罚款。到八月底，已了清土改赔罚手续的“过关”地主3603人，占88%。四是查田评产，搞好分配。查田评产是分配土地的基础，又是计划生产与贯彻合理负担政策的必要条件，因此必须查实田土面积和常年产量，加以精确计算，才能科学地合理地进行分配。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曾对分配工作作过重要指示，他说：“分配工作，在农民看来是件百年之计的大事情，如果一个村有一、两户人家分配不当，就使这一、两户人家生活过不好，心里不满意，生产情绪不高。一村如此，一个乡就会有几十户人家如此，一个县就会有几百户甚至上千户人家如此，这就成了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。”并指出“分配工作属于农民内部问题，如果有些干部包办，自私自利，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，一般农民对待这些当权的干部，很容易心怀顾虑，不敢讲话……很容易产生分配不公的现象。”胡主任指示：“分配前必须充分准备，分配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，走群众路线，分配后仍须仔细深入地进行检查，

确确实实保证把分配工作做得踏实妥贴，人人满意，有利生产。”五是健全组织，巩固胜利。在分配工作基本结束后，紧接着就要抓健全各种组织，其中包括进一步掌握三个刀把子（乡村政权、农协会、自卫队），建立青年团、妇代会、医卫、文教、工商等组织。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，进一步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。还要加强管制改造地主，督促他们订立守法公约和劳动改造计划。最后以乡或村为单位召开总结大会，总结工作，肯定成绩，表扬模范和好人好事。

四、主要收获：1、贫雇农掌握了三个刀把子。全县46乡394村，农协会领导成员有15252人，其中贫、雇农10219人，占67.1%，中农及贫苦知识分子5033人，占32.9%。农会主席、乡、村长4838人中，除1405个中农外，均为贫、雇农。农协会员有210060人，占总人口47%。全县自卫队员共有12951人，占总人口的2.87%；2、全县共没收了地主的田地150602.4亩，占田地总面积574303.2亩的26.22%。共征收土地50443.5亩，占总面积的8.78%，没收主要农具37862件、耕牛2103头、房屋35356.5间、多余粮食折合黄谷1066017.5斤。反违法斗争没收现金3793906190元，建筑器材及衣物等折价1819198760元，总共5613104950元，平均每户地主缴出现金、粮食折款共约105万元，缴出什物等折价45万元。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已削弱80~90%左右；3、基本上解决了雇、贫农无地少地户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困难。全县雇、贫农45614户，195736人。以没收征收土地201045.9亩计，连同少地户自己土地在内，平均每人可分得田地1亩左右，产量450斤。最多每人可分得1.4亩，产量630斤，最少亦可分得0.8亩，产量360斤。胜利果实折合现金每户最多可分到20万元以上，一般在9万元左右，最少在3万元以上。耕牛、农具等生产资料，每户基本上都分得了一份；4、镇压了反革命，惩治了不法地主、恶霸。清理了全部积案686件，审理了新案126件，分别情况处以杀、关、管。仅陇土改比第一期南部等县土改镇反控制严得多，判处死刑必须经案仲方副主任批准，因此，土改中杀人较少。新寺区二龙、新场两乡因未批准各错杀了一个，工作组长和执行人均受到了处分。但地主、恶霸、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的确不少，几乎每乡都有。还破获了新寺区文星乡反革命分子、恶霸地主刘放等组织的暗杀团，争取了“盖天党”、“反共救国军”等反革命组织中的胁从分子和土匪等二百余人自新，缴获了他们的反动证件。从政治上彻底打垮了地主阶级及其帮凶、爪牙们的威风，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；5、结合土改，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潮。全县95034户451213人中，有80%的家庭和70%的人口制订和修订了爱国公约。干部群众在增产节约的基础上捐献款15亿多元，8月底前收到现款1.2亿多元，完成了“朱德故乡号”战斗机的捐献计划。新寺区开展了“严有明运动”（注），迅速掀起了爱国增产捐献热潮，九龙乡有一个村妇女主任胡××，自愿捐献了一头大肥猪。

此外，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收获，就是锻炼了干部。经过土改锻炼逐步成长起来的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不少同志成了英雄、模范，有的还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奇迹，永远载入光荣史册。他们的成就和贡献有多方面的因素，但很多人认为与土改的锻炼、熏陶是分不开的。比如我这个从地主阶级家庭出身、从旧社会学校出来就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青年，通过三个月的土改工作，使我认识了许多新事物，学到了许多新东西，增长了许多新知识，接受了许多新经验，真是“胜读十年书”！主要在思想上的收获极大：基本上划清了阶级界限，分清了我、敌、友，从而转变了剥削阶级的立场和观点，开始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、观点，初步懂得了群众观点，学会了一些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，养成了吃苦耐劳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，还学到了一些对敌斗争策略和群众运动的方法等等。

注：严有明，仪陇新寺乡人，贫农，中年妇女。1951年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，自觉订立爱国增产捐献计划，她的计划具体实际。如多养母鸡，每天捐献一个鸡蛋；多纺棉，每月捐献一斤棉纱等（为期一年）。新寺乡土改工作组和新寺区土改工作团先后在全乡、全区开展“严有明运动”，号召全乡、全区农民群众向严有明学习，打出切实可行的爱国增产捐献计划，掀起爱国增产捐献热潮。当时川北日报作了报道。担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和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，还把仪陇严有明当作新英雄人物给以表彰。

回忆仪陇人民在军阀割据 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苦难生活

县政协委员 杜克明

我现已八旬，曾在旧社会当过乡长，作为县参议员，对仪陇自军阀割据始至新中国诞生止的三十多年中，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，就我所见所闻回忆于下，有错误的地方，请知情者批评指正。

一、军阀横征暴敛

1918年靖国军第七师师长颜德基占据达县、渠县、营山后，派李子实团驻防仪陇，仪陇人民便陷入军阀割据的泥沼里。驻军就是土皇帝，仗武力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（民国初年只按土地多少以石斗升合勺计征国课，每斗粮额年征银币贰元多，除此，别无其他杂课），从此人民的负担不断增重。

1919年，当李团调走后，颜师招收的土匪郑启和升为旅长，驻防巴中，见仪陇空虚，即派叶、杜两营进驻仪陇，强令农民种植鸦片烟，征收特重的烟苗捐及高额的国课（完粮叫完国课），每斗增至伍元多，再加上其他巧立名目的特别捐，人民的负担更重，生活极为困难。

1921年，刘存厚部的潘文华由陕南入川，打败郑启和，占领通、南、巴，派俞海清团驻防仪陇，大肆剥削民众，各种苛捐杂税的征收层出不穷。

1927年，二十一师师长田頌尧（后扩编为二十九军，田升任军长），派曾南夫支队战败潘文华，占领通、南、巴、仪等县，仪陇便长期成为军阀田頌尧的割据地。

曾南夫驻防仪陇时，受田頌尧之命招兵扩军，委任曾当过团总的邱子期（立山人）为司令官，司令部设在瓦子场，招兵成军。邱因招收渠河陈福钦的一支土匪入伍后又叛离，拐走枪弹、餉银、军装等而畏罪潜逃。曾南夫随即率一连人到立山，将邱的家属、亲友及其官佐捉来，搜索银币达几千元，方得收场。

田军据仪后，仍继续下令人民种鸦片烟，对烟苗捐的征收不断增重，国课先按粮额附加军餉每斗征银币肆元多，从民国十六年起至民国二十二年止的各年都要按粮额征收军餉银，一年征三次。这样一来，每斗粮额一年要负担银币拾多元，负担奇重，难以承受，便转嫁在佃农身上。催差登门串户催逼，勒索粮户，对逾期不完纳的以招商抬垫，

在收据上加盖“抬垫”二字，抬垫人可以持据向欠纳国课、军饷的人加倍讨还，致使一部分粮民倾家荡产。

在各军阀争夺地盘的混战中，军队经过的地区及战场附近的人民，要供给粮草副食，要派夫役运送军需物资及伤病员，遭受的损失更大，尤其是第三师邓锡侯、七师陈国栋的部队，被一军但懋辛打败，溃退过仪陇，驻在县城周围附近的民房内，经十多天的蹂躏，把老百姓养的鸡、鸭、猪、羊杀光，粮食、蔬菜吃尽，房屋拆下做柴烧，弄得不少贫苦人家生活无着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

二、地主残酷剥削

无地少地的农民要向地主租地耕种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租地要交纳佃金、租谷和压租钱（即租谷的抵押金，若次年交不清租谷便在压租钱项下抵扣）。佃金、压租钱未缴清前不得迁往居住，耕种其土地。租地的称佃客，出租地的称老板。佃客除向老板交纳租佃外，每年栽秧、打谷、交租子都要请老板吃饭，春节要割膀，称谢向老板拜年，中秋、端午节要送节礼，老板家成年人的生日要送礼祝贺，劳力强的佃客在农忙时还要帮老板抢收抢种（有些地主还留有部分土地耕种）。佃客辛苦一年，遇上丰年，秋收交租后可以吃点细粮，若遭荒年，庄稼欠收，不仅生活难度（靠地里收些红苕、杂粮、小菜糊口），地主还要逼租，有当年交不清租谷待次年小春收获后加倍补交小麦的，有向老板立借约待来年秋后加利付还的，有被老板将压租钱扣完，租不到土地，一家人各奔“前程”，壮实的出卖劳力，老弱妇幼乞讨生活的，有因受老板高利剥削，无力偿还，被迫逃亡他乡另谋生路的。如秋垭佃农冯三海，租冯姓清明会田地耕种，因租子奇重，年年交不清，连本带利积累到十几个大石，被族人逼得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，乃于1928年率妻子女逃往旺苍落户当佃农，类似情况各地皆有。尤其在抗日战争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，由于物价逐渐上涨，佃客交的压租钱也日益遭到贬值，地主便想方设法榨取佃客，年年升佃、加压、增租。如秋垭永乐村地主文作中，剥削佃客最残酷，每年栽秧后买活个别佃农向他假投佃，提高佃金、压金。原佃客知道后，既怕被夺佃造成搬家之难，又怕另租不到土地给一家人带来生活无着之苦，只得忍气告贷去满足他的要求，除此，哪有他法可施？致使一些佃客倾家荡产，逃荒四野。

三、官吏团保浮摊妄派

在军阀割据时期，县设县知事公署，县知事由军阀委任，下设教育、建设、征收、团练各局，局长由县知事报请军阀委任。全县分十九个乡，乡设团总，乡辖保设保正，保辖甲设甲长，甲辖牌设牌首。团总由县知事委任，保正由团总报请县知事委任，甲长、牌首由保正报请团总委任，一切由他们主宰，人民无权过问。因此他们上下勾结，

互相支持，任意剥削压榨人民。尤其是十人团把持县里的大权时，每年在烟苗捐项下附加四万多元，由县公署、县党部、各局及县中校等机关单位瓜分，团总、保正、甲长在摊派烟苗捐时还要逐层加码，仅烟苗捐一项全县人民每年要负担拾多万元银币。团总养有团丁几十，在筹派枪弹费、伙食费、被服费及薪饷时，还借机浮派吃缺（多报人数，多摊派）。保正雇的文书、传丁和他自己的薪水以及上面委派催款提款人员来场的招待费，由他随意报数，向民众摊派，老百姓无权过问。

四、土豪劣绅敲诈勒索

清末民初，各地形成了敲诈勒索的恶劣风气。土豪劣绅的爪牙横行无忌，鱼肉乡邻，随意提出一些不合理的土规章限制民众，有违反者轻则请客，重则罚款，平时无事钻窟窿寻蛇打，到处编弄是非，开烂条，当讼棍从中渔利，甚至安赃害民，撬索民众钱财，致使一些贫苦诚实人家遭受不白之冤而潜逃他乡或上吊致死。上述情况的出现，在黑暗的封建社会统治下，不少人以为命中注定，而不认识是土豪劣绅敲诈勒索所造成。

五、三大苛政如山压顶

在四十年代，国民党政府征粮、运粮、征兵的三大苛政压得贫苦人民喘不过气来，兹将见闻分述于后。

征粮。1941年开始征实（收稻谷），县政府增设粮食科（1942年粮食科裁撤，设田赋管理处）。当时全县划十九个乡（镇），每两个或三个乡成立一个征购办事处，设主任一人，稽征员每乡一人，车谷子、打斗的各一人。这年的征购数按粮额每斗征谷、购谷各壹石伍斗多，附加积谷（用于赈灾、办学、租用民仓、保安队食用等）陆斗多（均系新制市石，每石约120斤）。征谷包括中央公粮、省级公粮、县级公粮，购粮不全给现金，发百分之七十的粮食库券，百分之三十的现金（其中还配有部分储券）。库券、储券、现钞均凭购粮收据到县城领取，最初发的库券是临时券，后来又要拿临时券到县城去换取正式库券。正式库券分五联，这年购粮的百分之七十分五年扣还，每扣还一次裁去一联。由于领换的手续复杂，领换时拥挤不通，要排轮次，有时要等四五天才能领到手，大一点的粮户，到县城两次还比较值得，小粮户只得交给保长或推举人去代领，有被保长或代领人贪污的。库券、储券可以买卖，投机者以低价收买，弊病百出，第二年便停止购粮，加重征粮，粮食库券只扣了一年就作废了，储券也因货币贬值，借粮的、投机的都倒了霉。自1941年至1949年的九年中，征粮数量有增无减。那时没有公仓，所收粮谷要借用民仓储存。征收人员怕虫伤鼠耗出不够储存数和吃不上余额，借口谷子要跌价，冒斗收进，哪管有粮在册者叫苦呻吟。

2、运粮。中央粮、省级粮和购进粮要运往新政或河溪关加工成糙米，再船运到南

充嘉陵储运处，东南各乡运至新政有二百多华里，往返要五至六天，规定的运输副食费及口粮，县上克扣不发，运粮的民伕要自贴。新政的加工承包者，是当地的权威人士，聘有车谷、打斗的能手，施展他们的伎俩，运去的谷子经过翻车打冒斗，每石（十斗为一石）只能交出捌斗多。运粮以保为单位，每运一百石谷子要短交十多石，征购处要承运单位赔偿，胆小的保长便在保内摊派，收起来补运，胆大的保长，置之不理，留作悬案，还有的保长要运粮的民伕赔。民伕既出劳力，又贴伙食，还要赔粮，怎不怨声载道。

各乡对加工承包者冒斗浮收引起的事端，向县参议会发出呼吁。参议会不但不采取措施予以制止，反而派人到新政，与加工承包者狼狈为奸，互相勾结，共同坑害百姓，从中捞取油水。如经过商定，每加工稻谷一石，由承包者给参议会提碾米壹升伍合，还美其名曰“加工赢余”。参议会从中获得一万多石碾米，合稻谷二万多石，谁知加工承包者从我县人民手中掠夺了多少万石黄谷？

运粮是在农闲时出动，沿途成千上万的人拥挤不通，夜间除幺店、民房住满外，还有的在破庙、桥下、树林里过夜受露气侵袭。白天遇下雨，淋得衣裤湿透，由此得病有死于途中的，有回家病死的，也有转来在中途被别县别乡拉去抵壮丁的，从而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。一些有识之士，暗地向民伕宣传抗运，并动员保长要求县上即时把历年运粮的口粮及副粮费发下，否则不予领运。1949年有的保就没有领运一颗粮，还有胆大的民伕把领来的粮自己吃了。

3、征兵。1938年开始征兵，开初城市农村都有失业的青壮年自愿去应征，后来因收兵部队克扣新兵薪饷，给新兵吃糙米，甚至故意在饭里掺沙子，新兵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还遭受虐待，便无人自愿去当兵了。每遇征兵期间青壮年到处躲藏，推行抽签法也行不通，只得采取拉的办法。保长率领甲长组织拉兵队，对豪强户不敢去拉，富裕之家行贿送礼亦得到庇护，贫弱户的子弟成了唯一被拉的对象。兵役法规定不征独子，不拉外地人，但在征兵紧急时，不管独子、外籍，只要撞上就拉。

1948年，国民党处于败局，战争吃紧，征兵文、电交逼，县长荀麟派县警察中队官兵，到各区乡督征，并给手令，如乡、保长征兵不力超越限期者带县严惩。于是各乡长率警备队，象缉捕盗匪似的。白天在道路上、田野间、逢场在街市上拉，夜间包围民房到屋内搜捉，闹得鸡犬不宁、哭声遍野，社会秩序一遍混乱，致使不少人家夜不能安眠，昼不能下地，庄稼难以按时收割、播种，成遍田土荒芜，市场冷淡，逢场天广大青壮年及其家属不敢上街。保甲长拉不到壮丁被逼慌了就把有壮丁的家属捉去吊打或关着不放。如秋坝跃进村张宗金，有几个儿子，每当征兵都逃往巴中亲友家去了，保长文高麟在秋坝街上唆使乡公所警丁，把张宗金捉来吊起，我（当时任六合乡乡长）发觉后批斥了保长，斥责了警丁，才将张宗金释放。还有，不愿离乡背井去替国民党卖命当炮灰的一些青壮年，在抓兵逼得日难落屋、夜难归家的困境下，忍痛刺瞎右眼，刺去右手食指，致残终身。上述事例到处都有，举不胜举。

由于蒋家王朝面临覆灭，征兵越来越紧，向保、甲长行贿送礼的也渐获幸免。由

此，逼出一些人起来抗征，如中坝乡有个壮丁户向保长行贿，耗尽家财，仍不得免，气急之下，持刀杀死了保长。另有一对正在举行结婚典礼的新婚夫妇，新郎被拉，新娘拿起菜刀同保长拼命。在此乱世之下，一些有识之士为青壮年出点子，叫他们组织起来集体自卫。一闻征兵消息，互相通风报信，拿起刀矛棍棒，隐蔽在深山茂林。如六合乡小罗池保杜于翼等十余人，组织起来抗征，每当征兵开始，便集合在大垭松林里持械抵抗，致使该保有一年来未拉走一个壮丁。

拉到的壮丁由保送乡，乡再转送到县。途中都是用绳子拴在壮丁手腕上一个联一个，以防逃跑。但在乡上或途中有得钱财放走的，也有用钞票从收兵营里取回的。可无钱者，虽有在收兵营逃跑回家的，但也有因逃跑被开枪打死打伤或给家里带来灾难的。如大罗乡鲜红村周春茂的儿子周国富，在收兵营翻墙逃走，收兵营的连排长来到大罗，将周春茂捉到营里关起。家中无计可施，只得将尚未成熟的几亩水稻抵当几万元票子送去才赎回。收兵部队在我县卖放壮丁、强拉青年抵数、贪污壮丁粮饷、枪杀毒打壮丁、勒索壮丁家属、奸淫妇女、霸占民妻、砍伐百姓树木、抢摘人民瓜果蔬菜等无数事实。受害者、参议会、兵役协会屡向剑阁团管区提起控诉，但均无结果。

六、乡镇长专横贫苦人民遭殃

我县四十年代的乡镇长，有的是青帮师傅，有的是红帮哥老会的大爷，有的两帮均占，他们既掌握了政权，又利用帮会收徒弟收兄弟伙，拉帮结派，保长、甲长、地、富、土劣以及他们的子弟都去投靠，形成一个享有特权的集团，横行乡里，欺压善良，强夺田地，勒索民财，霸占民妻，虐杀无辜，把征兵、运粮、摊派各种苛捐均转嫁在贫苦劳动人民身上。当时流传这样两句话，“乡镇长昧良心，人民眼泪湿衣襟”。深刻反映了乡镇长专横，贫苦人民遭殃的真实情况。

七、货币贬值人民受害

1936年，中国农民银行和四川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开始在我县流通，但地匪（重庆）发行的钞票于第二年便停止使用。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相继出现，四川省银行发行的伍角辅币，同在仪陇市面上使用。到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党政府不从发展生产着手，专发钞票作财政收入。1940年下半年出现五十元的钞票，以后逐渐升级，陆续出现壹百元、伍百元、伍千元、壹万元、拾万元……大额法币，同时发行壹元抵法币贰拾元的关金券，票额也相续陆续增大，市场物价随着上涨。年年涨，月月涨，天天涨，到解放战争后期达到飞涨。一盒火柴都要几万元，万元以下的钞票变成了废纸。国民党政府为了解决这一经济危机，又发行了壹元抵法币叁百万元的金元券，收回万元以上的法币，但后来金元券也同法币一样，票额逐渐增大。到1948年

金元券变成了无用的废纸。1941年至1948年的八年中，由于通货膨胀，人民遭受的损失惨不堪言。雇农得一年长工，缝不起一件土布衣服，贫苦人民出卖劳力，帮零工积的工钱上街想买升米，回家为老小熬口粥喝，但票子不用了，米也买不回去了。农村妇女常熬几夜，统一斤棉线卖了，转身就买不回一斤棉花；织布的小手工业者上街卖布的时候，时隔不到一小时就买不回织一丈布花去的棉纱；做盐生意的从新政坝或碑湾挑盐，往返五、三百里，卖了盐再去买盐，票子不用了，本钱失光，放空回家。农民、街道居民、小手工业者、小商贩等，无不因货币贬值而受其害，造成有的生活无着，乞哀告怜，有的迫入歧途，行窃作匪。

八、土匪猖獗民不安生

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，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腐败日胜一日，人民群众惨受贪官污吏、乡镇保甲长、地富土劣的残酷压榨剥削及烟、赌泛害，致使一部分人为匪。其中有因形势所诱、生活所迫沦为土匪的；有因吸食鸦片烟而破产的烟鬼为匪的；有赌钱输光了的赌二哥当匪的；有负债深重难还的农民及小商贩去当匪的；有逃避兵役无处安身的青壮年去当匪的；有受压迫受欺侮图报复去当匪的；有受亲友引诱而当匪的，除此，还有三五成群，见财起意，拿起锄把扁担，专抢贫家小户谷米、杂粮、衣物等的一伙歹徒，翻上各地通匪、窝匪的地头蛇，形成匪患到处害人。夜间打家劫舍，白天在幺店、隘口关围，拦劫客商，全县不少人家被抢掠、遭杀害。保安队、警察所对清剿土匪畏死不前，甚至有时把土匪包围了，只要匪徒扔点票子或财物便放走。乡上的警备队平时对老百姓要索，神气十足，一旦遇到抢劫案件报警却迟迟不予出动，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，让匪为患。当时的确是坏人当道，好人遭殃的社会。人民多么盼望共产党、解放军到来解放人民，建立起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。